昆明学院学报　2021，43（2）：112～120　ISSN 1674－5639　CN 53－1211/G4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民族文化】

边疆跨境民族杂居地区民族互嵌研究

——以云南怒江州片马镇为中心的考察

罗　青
（云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对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片马镇民族互嵌进行考察，发现当地民族在长期杂居共处与互动中，在居住格局、语言、文化、社会交往以及生产等方面形成民族互嵌状态，以多重文化认同为内在机制巩固着边疆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建设与发展。多重文化认同既是多民族地区民族互嵌式社区构建的结果，也是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的重要基础，从心理层面维系和巩固着边疆地区的民族团结。

关键词：民族团结；民族互嵌；文化认同；边疆地区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21）02－0112－09
DOI：10.14091/j.cnki.kmxyxb.2021.02.018

The Study of Ethnic-group Mosaic in Cross-border Multi-ethnic Areas
—An Investigation on Pianma County of Nujiang Prefecture in Yunnan Province

LUO Qing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History，Yunnan Minzu University，Kunming，Yunnan，China　650500）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on ethnic-group mosaic in Pianma county of Nujiang prefecture in Yunnan province，this article indicates that the local ethnic groups have formed an ethnic-group mosaic state in terms of living patterns，languages，cultures，social interaction and production activities. The ethnic-group mosaic community in the border areas are continued and consolidated by means of multi-cultural identity. Multi-cultural identity i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thnic-group mosaic community in multi-ethnic areas，but also an important basis for its construction. Multi-cultural identity maintains and strengthens the ethnic unity from the psychological level.

Key words：ethnic unity；ethnic-group mosaic；cultural identity；border areas

一、引言

2014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提出“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1]。此后，围绕“民族互嵌式社区”的讨论与研究逐渐展开，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当前，关于“民族互嵌式社区”的界定有很多，但总体上认为“民族互嵌式社区”是指多民族（两个及两个以上民族）共居于共同的地域空间范围内，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深度交往交流交融与相互联结，是实现民族团结的重要路径。在众多讨论中，有些学者提出用“社会”替代“社区”概念更符合对“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这一表述的解读和把握，并指出“互嵌式社区”容易陷入片面地强调民族之间的空间关系，忽略社会结构而仅对社区环境作考察[2]7。目前，有关民族互嵌式社区如何建设，或建设怎样的互嵌式社区，形成诸多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成果，而针对建成之后“互嵌式社区”的实际现状及如何稳固的讨论较少。鉴于此，本研究希冀通过对云南边疆多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个案考

收稿日期：2020－11－13
作者简介：罗青（1991—），女（纳西族），云南昆明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南民族与跨境民族研究。

察，深化对边疆民族地区“互嵌式社区”建设与发展的认识。本文以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怒江州”）片马镇为考察点，在田野资料和文献分析的基础上，从生活空间、社会生活、文化三个维度观察当地民族互嵌的现实状况，认为片马镇当前的社区环境呈现出居住格局、语言、文化、社会交往以及生产等方面的多民族互嵌状态，这种互嵌状态的形成是历史、地理、文化、政策等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在民族互嵌过程中生成的多重文化认同机制，即根据具体场景形成不同层级的文化认同，为“民族互嵌式社区”的稳定与发展提供了心理基础与保障。区域民族互嵌的深入，为地区较高层次认同的实现提供了现实基础，并且文化认同作为民族之间一种“无形”的嵌入，从精神和情感层面巩固了“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建设成果，增进了地方共同体的认同，促进了地方民族团结。对边疆多民族社会而言，民族互嵌式社区的良好发展为边疆社会的安定、团结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考察点——片马镇，隶属于怒江州泸水市境内，下辖片马、古浪、岗房、片四河 4 个自然村，西、南、北三面与缅甸克钦邦相接壤，是怒江州唯一的国家二类开放口岸。片马镇总人口较少，全镇 4 个自然村共 546 户，人口 1 856 人。片马地区以傈僳族、景颇族、白族为主要民族，汉族、彝族等人口较少。片马最早的世居民族是被称为“茶山人”的景颇族支系，其分布在片马村、岗房村、古浪村一带。傈僳族是片马镇人口最多的民族，4 个自然村中均有分布且占多数。当地的勒墨人是白族的一个支系，其主要分布在片四河村，少数分布在其他村落。当地汉族、彝族等则人数少且散居于各村落中。结合调查点的实际情况，本文从生活空间、社会生活、文化三个方面对片马镇民族互嵌的现状进行观察与探讨。在此次实地调查中，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收集资料，以户为单位共发放户访问卷 100 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 97 份，受访者中傈僳族 63 人、景颇族 15 人、白族 15 人、汉族 4 人。访谈的对象为当地村民、民族文化传承人和政府工作人员等。

二、片马镇空间互嵌

空间层面的互嵌具体表现为地方民族居住格局的变化过程。居住格局是空间关系最直观的表现，是对民族互嵌浅层次的考察。居住格局的互嵌作为民族间社会交往的客观条件，对民族关系具有最基础的影响力[2]151。居住格局是一个特定区域内各民族居住空间的组合状况。总体上，片马镇各民族的居住格局呈现民族杂居，民族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居住界线，并且这种多民族杂居的格局趋于不断强化。

从片马镇整体民族居住分布来看，以片马镇政府所在地片马村为中心，片马村是傈僳族、景颇族、白族以及汉族等多民族杂居的村落，离片马村较远的片四河村以白族与傈僳族为主，距离最远的古浪村与岗房村以傈僳族与景颇族为主。这里没有单一民族集中居住的村落，每个自然村都是两个及两个以上的民族共同居住。从自然村内部的居住格局来看，民族之间并未形成明显的聚族而居情况，民族之间互为邻里、交错杂居。

调查问卷在“您居住的周围邻居是否有其他民族”的问题中，有 90 人选择“有”，3 人选择“没有”，4 人未答。笔者在对选择“没有”和未作答的村民询问时，他们给出的解释是“住得偏僻，周围没有邻居”。在问卷“您是否介意邻居是其他民族”的问题中，有 93 人选择“不介意”，2 人选择“介意”，2 人选择“没考虑过”。其中，选择“介意”的 2 人为 60 岁以上老年人，因为语言不通，其更倾向于与本民族生活交往。上述问卷的回答也反映出村落内部民族之间并没有人为明确或潜在的居住划分，民族身份并不直接影响居住选择或偏好。但同时在访谈中也发现，当前民族杂居的居住格局也并非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如此，许多当地年长的老人表示，过去景颇族（茶山人）和傈僳族也是各有各的村子，但现在村里什么民族都有，都住在一起①。老人的说法也间接反映出当地民族居住格局经历了从民族聚居到民族杂居的变化过程。

①访谈对象 1：波 MY，女，白族，55 岁；访谈人：罗青；访谈时间：2018 年 9 月 19 日；访谈地点：片四河村。访谈对象 2：克 JM，女，傈僳族，67 岁；访谈人：罗青；访谈时间：2018 年 11 月 20 日；访谈地点：古浪村。访谈对象 3：董 QL，男，景颇族，50 岁；访谈人：罗青；访谈时间：2018 年 11 月 24 日；访谈地点：下片马村。

引起这种变化的缘由，就客观条件而言，首先最直接的原因是由于片马地处高黎贡山西坡腹地，这一带山多平地少，没有大规模聚族而居的地理条件。随着当地人口的增多，紧张的土地资源使得民族杂居成为必然趋势。其次是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当地逐渐实现了村村通电、通公路，个体的生活交往不再囿于一地，村落之间的人员往来更便捷，因而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也逐渐增多，彼此了解不断加深。另外，就主观因素而言，在党和国家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的指引下，以及民族和谐共处的长期宣传教育影响下，当地各族民众逐渐内化这些价值观念，在民族交往与日常生活中，能够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具有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总之，民族观念的转变、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基础设施的改善等因素，促使片马地区多民族杂居的形成，在这些内外条件的不断加强下，这一趋势仍将继续。

民族居住格局是民族空间分布特征的表现，共同的生产生活空间为各民族开展社会互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杂居的空间环境使得民族之间具有更近距离的接触。构建民族互嵌型社区，就是为了打破不同民族之间的居住隔离，提高社区内民族混居水平，增加社区成员对他民族的了解[3]。已往研究认为民族杂居增加了民族之间相互接触的机会，有利于增进彼此的了解，而民族隔离的社区则容易造成民族间不同程度的疏离，更容易导致偏见与歧视的产生，不利于民族关系的长远发展。因此，片马镇杂居的社区环境为当地各民族的社会互动和文化接触提供了客观条件，由此促使民族之间进入更深层次的互动与关系联结。

三、片马镇社会生活的互嵌

社会生活主要包含生产活动与日常生活领域，在实际考察中，主要观察地方各民族的生计方式、社会交往、通婚情况等方面。社会生活领域的互嵌属于较深层次的互嵌，是社会整合的重要内容，也是考察民族关系的重要维度。增进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社会互动和社会参与是通过社会融合来构建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的具体策略；反之，这种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也必然能够增进和巩固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4]。建立“民族互嵌式社区”就是要打破民族之间的社会边界，促进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相互参与，最终达到社会融合，巩固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

（一）生计方式

片马镇是怒江州唯一的国家二类开放口岸，目前片马镇以农业种植、自然资源开发和边境口岸贸易为主要地方经济形式。当地人则以农业种植和外出打工为主要生计方式，少数从事个体经营或其他营生方式。在农业方面，当地的生态环境适宜种植泡核桃、重楼、草果等经济作物，近年来，随着内地市场需求的增加，当地人不断扩大种植面积，并成立了相关企业进行统一收购、加工和销售。目前，全镇共有企业 20 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4 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对当地热销的几类农产品进行统一的加工和销售，形成小规模的产业，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加强了乡民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合作。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村落内各民族共同参与的合作经济组织，在社会关系构建的意义上，农民专业合作社促进了各民族在经济上的联结，并且当前片马镇以高价值经济农产品销售为主的区域经济规模的形成和发展，为区域各民族带来的经济效益是整体性的。在当代市场经济的影响下，边疆地区各民族需要共同面对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和风险，在共同参与地方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区域经济共同体不断强化，利益的相关性促进各民族之间的联结不断加深，建立了更为牢固的社会联结。

（二）社会交往

日常生活领域的互嵌则意味着民族之间在私人领域内接触的拓展以及发展为更深层次的融合，如民族通婚。通常认为全面、频繁且深层次的族际交往有利于民族之间的深入了解和融合，因为更深入的交往更有利于减少偏见和歧视，增强民族之间的认同感和亲切感。片马地区民族杂居的居住格局为当地民族之间的社会交往提供了客观条件，调查显示，在民族交往经历的调查中，与其他民族“经常来往”占 79.4%，“偶尔来往”占 19.6%，“从不来往”的仅 1 人。在民族交往对象的调查中，58.8% 的村民表示日常交往对象为当地各种民族，并不限于某一民族群体。可以认为，族际交往是当

地社会生活的常态，当地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都有与其他民族交流互动的经历。在过去，民族之间就存在农忙时相互帮工的现象，现在随着民族通婚的增多，各民族之间也开始走亲串戚，在日常生活中走亲访友、婚丧往来、节庆互动活动逐渐增多。

民族间的社会交往也集中体现在社区公共活动之中，在民族节庆活动和宗教活动中，这种民族互动更为直观。譬如，当地每年举办的射弩比赛活动，这里的“弩”原本是傈僳族成年男子的狩猎工具和防身武器，是傈僳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特征。然而，如今作为社区公共活动，参与者不限于傈僳族，已经成为各民族青壮年共同参与的集体娱乐活动。另外，还有当地一年一度的大型节庆活动“目瑙纵歌节”，原本也是景颇族的传统节日，现在则成为各民族欢聚一起载歌载舞的联欢活动；节日当天人们身穿各自的民族服饰，共同跳着景颇族的舞蹈，遵循传统的仪式活动。可见，这些节庆活动不仅突出地展现了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也体现出当地各民族对地方民族文化传统的共同传承，彰显了民族之间对彼此文化的尊重与包容。此外，当地的宗教信仰活动也呈现出多民族参与互动的态势。当地各民族大多信奉基督教，教堂是信教者的主要活动场所，目前片马共有 3 所教堂，分别位于岗房村（2 所）和古浪村（1 所）。在调查中了解到，老人和女性是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古浪村的 CFL（女，傈僳族，42 岁）告诉笔者“我们（指当地各民族）都会过圣诞节，每周都会去教堂一起做礼拜、唱歌，大家都一样的”。片四河村的 ZL（女，景颇族，35 岁）说道：“我父母及全家都信基督教，我从小就跟着父母去教堂了，我丈夫不去，但我会带孩子去”。信奉基督教的村民每周都要去教堂做礼拜，还要共同筹办庆祝宗教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等。

（三）通婚情况

民族互嵌的程度可以族际通婚为重要的衡量标志，族际婚意味着把“异族”吸纳进了“本族”的群体内，是民族互动深层次发展的结果。因为只有两个民族相互接受和认可彼此的文化，在整体上能够融洽和谐相处时，他们的成员中才有可能出现一定数量和比例的民族通婚[5]。族际通婚是不同民族长期交融与深度融合的重要表征，是多民族杂居地区民族关系和谐与文化认同度的重要标志。通婚意味着民族之间在语言、习俗、宗教等方面互相包容与接纳，在日常生活中彼此之间并不排斥，社区内对族际通婚也不反对甚至持有积极的态度。在婚姻调查中，族际通婚家庭占比为 34.4%，共有 31 对族际婚，其中傈僳族与景颇族通婚 16 对，傈僳族与白族通婚 8 对，傈僳族与汉族通婚 2 对，景颇族与白族 1 对，景颇族与汉族 2 对，白族与汉族 2 对。有研究认为，当民族间的通婚率达到 10% 以上，则可以说他们之间的民族关系是比较好的[6]。同时在族际通婚态度的问卷中，91.6% 的人对族际通婚持支持的态度，认为只要双方自愿就行。由此可以认为，片马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社会关系总体上呈现出良好且较为亲密的状态，这是民族之间具有较高认同感的体现。

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各民族之间的互动增多且联系日益紧密。并且在走访中也了解到，当地民族之间没有发生过较大的利益或文化冲突，在日常的交往互动中大多数时候以和平友好的方式为主，这既是民族之间有效互动的结果，也是促进民族间社会互动与联结深化的有利因素。因此，在社会治理方面，加强多民族地方各民族平等发展与文化保护，对促进地方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建设至关重要。在片马，民族之间相互交往、相互参与的加深，促进了民族间的认同感与联结感，这种民族关系的深化最终以族际通婚为表现。婚姻关系的建立深刻反映着民族关系的好坏，也反映着民族互嵌格局是否牢固[7]39。也就是说，族际通婚标志着民族关系的发展方向，意味着民族融合，同时民族之间亲属关系的加强，使得生活中各民族之间不仅互为邻里，还互为亲友，总之推动了民族间社会交往与社会参与，巩固了民族互嵌的社会结构。

四、片马镇文化互嵌

多民族的社区环境意味着区域文化的多样性，如何在保护各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有效调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成为当今多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文化关系的发展通常呈现为三种结果：一是文化同化；二是文化涵化；三是文化冲突。而我们所谈的文化互嵌属于第二种情况，也就

是两种文化融合了，各自保留了优秀的部分，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此时所形成的民族互嵌格局，文化就属于互嵌[7]40。文化互嵌是衡量民族互嵌的重要指标，在调查中，通过对片马地区语言使用、宗教信仰、民俗活动等方面的考察，来观察当地民族文化互嵌的现状。

（一）语言使用

语言是民族最重要的文化标识之一，语言使用是民族认同的重要体现。在多民族的片马地区，语言兼用的现象十分普遍，呈现出不同语言在使用中协调有序，在和谐中各尽其责的局面，并且随着语言兼用的普遍发展，还出现了语言掺杂的情况。调查显示，大多数当地人能够使用傈僳语进行日常交流，但是熟练程度因人而异。其中，70.6% 的受访者能够熟练使用傈僳语，也就是能够满足日常生活中的交流；29.4% 的受访者表示能够用傈僳语沟通但不能深入交流，结合这些受访者的其他信息来看，他们大多是从外地搬来的非傈僳族，少数人则是当地年纪较大的非傈僳族老人。尽管他们在长期的生活交往中逐渐掌握了一些傈僳语，但他们接触傈僳语的时间较晚，大多是在成年之后，与那些从小就接触傈僳语的本地中年人和青年相比，傈僳语水平较弱。总体上，傈僳语是当地社会生活的必备社交工具之一，尽管傈僳语使用水平因人而异，但当地大多数人能够使用傈僳语进行日常交流。这是因为傈僳族在当地具有人口优势，这使得傈僳语自然而然成为地方通用语，也就是当地民族之间日常生活的主要交际语言，是较多人使用的族际交流用语。

然而，近年来汉语的使用人数也不断增长，尤其在青年群体中汉语的使用更频繁，汉语成为仅次于傈僳语的常用族际交流用语。根据调查，此次受访者都能够使用汉语，只在熟练程度上有差异，其中，58.8% 的受访者表示能够熟练使用汉语对话，40.2% 的受访者表示只能进行简单的沟通，并且有 1 人表示基本不会。笔者认为这位受访者因为年纪较大，并且从未受过教育，加之外出经历也较少，所以没有太多机会学习和接触汉语。目前，片马人民汉语使用的增多与水平的提升，这与政府的积极推动以及地方社会的不断开放有关，一方面，在乡村普通话推广的工作中，政府通过发放装有汉语学习 APP 的手机来开展普通话培训，同时在学校教育中，从幼儿园到小学都实行了普通话教育，为当地儿童的汉语能力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随着人口流动的频繁，为了外出打工、学习及交流，当地人学习汉语的动力增强，汉语水平不断提升。可以说，汉语作为外来语言逐渐在当地民族的交流用语中凸显优势，但鉴于汉语水平在各年龄段人群中的差异较大，目前仍然难以完全取代傈僳语在当地的族际用语地位。

此外，本地景颇族使用的“茶山语”和白族使用的“勒墨语”则主要在民族内部使用，其他民族使用这两种语言的人数较少，并且水平一般。在傈僳族与汉族的语言使用调查中显示，傈僳族 63 人中 42.9% 的人会使用景颇族的“茶山语”，7.9% 的人会使用白族的“勒墨语”，剩余 49.2% 的人表示两种语言都不会。在汉族 4 人受访者中，1 人表示会使用景颇族的“茶山语”，1 人会使用白族的“勒墨语”，而这两人恰好分别与景颇族和白族通婚。可以认为，当地傈僳族和汉族掌握景颇族“茶山语”和白族“勒墨语”的人数少，并且在这些使用者中，有人是因为家庭成员中有景颇族或白族，有人是因为住在景颇族或白族人家附近，因生活的需要而学习了“茶山语”或“勒墨语”。由于景颇族和白族在片马地区缺乏人口优势，因而景颇族的“茶山语”和白族的“勒墨语”并不能够起到当地族际之间的交流用语功能，也仅被少数其他民族的人群使用，但作为民族语言在民族内部仍然是重要的交流工具。这在关于民族群体内部语言使用的调查中得到了证实，88.7% 的受访者表示与本民族同胞交流会使用本民族语言，很多人强调民族语言是母语，是自己最熟悉的语言，理所应当要使用。然而，也有 11.3% 的受访者表示即使是与本民族同胞交流也偏爱使用傈僳语或汉语，这部分人大多是年轻人，相较于父母辈，他们在生活中使用傈僳语或汉语更多。总之，人们对本民族语言具有的亲切感和认同感，维持了地方民族语言的使用与传承，这对地方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来说起到了保护作用。

片马的语言使用情况调查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当地语言兼用现象很普遍，大部分村民都是多语

使用者。多语使用的出现是民族交往的结果，是语言接触而产生的语言使用现象，但不同语言的兼用情况却有差异，有研究指出，人口总数越多、分布越集中，其语言使用越稳定，越不需要学习别的语言，反之，人口总数越少、分布越分散，其语言使用越容易受到冲击，越需要学习、兼用别的语言[8]，这一特点也体现在片马的语言使用中。片马地区傈僳族人口最多且分布在 4 个村落中，景颇族和白族人口较少且居住较为分散，汉语和其他民族人数最少，散居于村落之中。因此，就片马的语言兼用情况而言，民族之间的人口差异和居住格局使得片马各民族语言在功能上形成差异，针对使用者的不同需求，不同语言具有不同的适用场合与范围。总体来说，傈僳语是当地内生的族际交流用语，适用于日常生产生活以及傈僳族内部的沟通交流。汉语作为中华民族的语言，在功能上不仅是外来的族际交流用语，还是当地人外出工作、生活以及读书、学习的必备语言技能，因此汉语的使用范围更广。而当地景颇族的“茶山语”和白族的“勒墨语”则更多在民族群体内部使用，其功能主要体现为联结民族情感的纽带。

值得注意的是，片马人民在语言使用中有时会出现语言掺杂的情况，交谈时会时常夹杂其他的语言，有时是一句话，有时是一个词语。有研究表明，当不同语言的说话者密切地接触时，这种接触会影响另外一种语言，并带来语音、词汇、句法、语用等的变化[9]，片马民族杂居的社区环境为各民族语言的接触提供了机会，各民族在日常交往中相互吸收彼此的语言表达，个体在语言习得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将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融会贯通，最终以语言掺杂的形式表现出来。总之，语言使用与人们的外部环境息息相关，多民族杂居的环境促使人们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以应对生活中民族之间的沟通交流。从语言使用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多民族地区语言文化的互嵌状态。片马民族互动的需求促使语言兼用的形成，多种语言“和谐共存、各司其职”正是片马真实的语言生活写照，也是语言互嵌的表现，而语言掺杂的出现意味着更深层次的语言互嵌形态。

（二）宗教信仰与民俗文化的互嵌

片马是一个多元文化交织的地区，从文化源流来看，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中国汉文化以及现代文化都属于外来文化，本地的传统文化以景颇族的茶山文化与傈僳族文化为代表。不同的文化传统在这里相互接触、碰撞并且发生融合，最终形成了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相互交融的格局，这在实际生活场景中体现为宗教信仰与民俗文化的互嵌。

片马的宗教信仰过去是原始信仰，然而随着基督教的传入，基督教逐渐取代当地的民间宗教信仰，成为片马地区的主要宗教信仰。在调查中得知，目前当地已经没有专门负责传统宗教仪式的被称为“尼扒”“尼玛”的祭祀巫师，只有被称作“马扒”“密枝扒”的基督教宗教人士，他们负责布道和讲解经典、仪式和教规，并且负责教会的日常事务，组织教会活动。根据当地人所反映的情况，当地信奉基督教并且经常参加教会活动的主要是年长者、女性及儿童，男性参与者较少，并且许多曾经信教的青年在打工和求学归来后，也很少再重新信教。当地信仰者的生活方式与其他人有一些差异，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要遵守当地基督教所要求的基本规范即“十条教规”，许多受访者也谈到信仰基督教就要禁止抽烟、喝酒，并且每周都要去教堂做礼拜等。参与信仰活动的人群中有傈僳族、景颇族、白族以及汉族，并且这些行为规范对当地各民族的信仰者来说都是相同的，所有人都必须遵守。

在其他民俗活动中，民族之间也没有明显的排异或隔离，各民族对各自传统文化、中华民族共有的传统节日以及共同宗教节日等普遍持有共同情感，并表现出积极参与和分享的态势。譬如春节，融合了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饮食传统，成为当地一年一度最重要的节日，还有国庆节、中秋节等中华民族共同的节日也被当地各民族接纳。此外，当地的宗教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还有民族节日如景颇族的新米节、目瑙纵歌节，傈僳族的阔时节、刀杆节等，这些节日都逐渐演变为当地各民族共同参与的民俗文化活动。在调查中看到，这些活动的参与者已经不再仅限于民族群体内，而是各民族共同参与的地方集体活动，譬如射弩比赛、目瑙纵歌节、圣诞节等，这些原本作为民族特征的文化事项，在多民族长期的共生环境下，已经成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事项。并且在不同的节庆活动中呈现出

多元文化融合的态势。当地民众对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具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能够在互动中自然地遵循各民族的传统习俗与规范，这体现了民族之间对彼此文化的尊重与包容。

语言使用的格局反映了民族之间的关系，体现了区域各民族对不同文化的态度，语言互通是不同民族互动的前提。同时，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在互动中逐渐发展为区域各民族共享的文化，各民族的文化特征，诸如民族服饰、婚丧礼俗、饮食习惯、传统节日等，在民族互动与交流中不断碰撞、融合，最终呈现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传统。可以说，各民族长期的相互接触是文化互嵌的基础，只有不同文化相互接触与碰撞，才能形成文化之间的交融。文化互嵌是当地各民族文化互动的结果，也是当地人对地方各民族文化传统接纳与认同的表现，最终以地域文化的形态作为整体展现出来。总之，文化互嵌对民族间的认同起到了催化作用，文化互嵌促使不同民族因文化而实现了相互认同，在长期交融过程中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五、民族互嵌与多重文化认同

民族互嵌何以可能，多民族国家更容易发生民族混居型的民族互嵌现象，民族互嵌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和结果[10]。以此来看，在多民族国家，民族互嵌即可以是一种自然呈现的状态，也可以是主观意志的体现。从片马镇民族互嵌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民族互嵌是一个内外合力推动的过程，既有外力的主动作用，也有形成民族互嵌的历史人文基础。外部力量是民族互嵌的重要推动力和保障，而内部力量则是民族互嵌不断深入和巩固的重要动力。外部力量通过转化形成内部动力，实现地方民族互嵌结构的再生产，而多重文化认同机制是这一结构再生产过程的内在动力。可以说，多重文化认同是民族互嵌构建的结果，亦是民族互嵌建设和巩固的基础动力，从心理层面维系和加固了地方民族团结。

（一）民族互嵌构建的内外机制

从民族互嵌式社区构建的外部因素来看，首先，民族互嵌作为重要的民族政策，政府的支持是民族互嵌的重要外部力量。在西南民族地区国家通过异地搬迁、政策吸引等方式促进民族杂居，目的在于积极推动族际居住格局，增进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因为从群际接触理论来看，族际接触能够提升族际关系，而社区内部的族际居住格局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族际接触和族际交往的水平[11]。同时，国家不仅积极推动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也通过宣传与教育改善人们的民族观念，促进民族之间对文化差异的包容与接纳。在片马，地方政府的参与和推动是民族文化得以保护和传承的重要力量，当地政府不仅号召当地文化名人搜集、整理各民族的传统民族音乐以及发扬民族艺术，并且积极参与和推动民族文化活动的举办。譬如位于片马镇中心的文化广场，又称目瑙广场，就是由政府投资建设的。民族文化广场为片马各民族公共文化活动的举办提供了场所，目瑙纵歌节、射弩比赛等都是在这里进行的。在政府的积极带动下，当地人对文化保护的自觉性以及文化活动参与的积极性也不断增强。其次，学校对儿童民族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等观念正是通过学校这一育人场所，在日常教学活动和学校生活中得以不断强化，对他们形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在日常生活的互动实践中得以体现。片马镇共有 1 所中心完小和 4 个学前教学点，这里各民族的儿童从幼儿开始就在共同的学校中学习，他们在学校里获得同等的教育，也在学校生活中接触到了不同的民族与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更易于接纳不同的文化。可以说，学校作为一个特殊的教育场所，对提高人们的文化认知，打破民族界线，促进跨民族的认同具有重要作用。再次，市场经济作为重要的影响力也从外部推动着地方民族互嵌式社区的构建。如今市场经济的作用力无处不在，对位于边疆偏远地区的片马来说亦是如此。市场需求促使片马地区的农民集体大规模种植泡核桃、重楼、草果等高价值经济作物，并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区域规模，加强了片马地区各民族的经济联系。

外部力量是民族互嵌的重要推动力，但是要实现多维度、深层次的互嵌以及延续和巩固民族互嵌的社会结构，就需要将外力转化为内部动力，积极依靠地方内部的力量来实现。就片马镇情况而言，当地正处于一种良好的民族互嵌状态，从地方社会

的内部视角来看，首先，各民族对民族交往和通婚的态度是友好且支持的。这种态度的形成既是国家民族教育和宣传的作用，同时也是地方社会内部自然形成的。当地各民族经历了足够长的共生时期，面对共同的生存环境，在长期的相处过程中，已经对当地不同民族有了足够的认知，因而能够以更加包容的心态来面对文化上的差异，理性处理民族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内生的民族观念促进了地方民族互嵌的构建与延续。其次是地域文化的形成。地域文化的形成需要时间的积累和文化的长期互动和积淀，并非简单地依靠外部推动就能够达成。各民族在交流中，经过反复地了解、筛选、重塑彼此文化这一时间过程，才逐渐呈现出文化融合，形成区域共享和被各民族认同的文化形态。片马的地方族际通用语、共同宗教信仰以及共享的文化事项等，正是民族之间在长期的互动中才逐渐形成且被当地人普遍认可的地方文化特征。地域文化作为地方各民族共享和认同的文化，是民族互嵌的表征，也是民族互嵌的基础。再者，各民族在互动中形成的多重文化认同是民族互嵌延续和巩固的重要内在动力。过去，人们的日常生活主要是在民族内部进行，因此民族认同是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认同形式。民族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12]。民族认同以文化认同为基础，它通过一系列文化要素包括语言、宗教、习俗、地域等表现，文化要素构成了民族认同的主要内容[13]。然而在民族互嵌建设的实践中，空间、文化、生活、经济等方面的民族交融使得民族之间的关系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族际关系的构建愈发重要，促使地方民族关系越来越密不可分。随着文化、社会交往、经济、政治等诸多要素的改变，文化认同也因此发生了的变化。较之过去以民族文化为根基的文化认同，如今认同逐渐呈现多重性的特征。在片马民族互嵌的过程中，各民族形成了以民族文化认同、地域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为基础的多重文化认同形态。

（二）民族互嵌与多重文化认同的互构关系

民族互嵌是多民族社会的一种理想社会结构模式，旨在促进民族团结。民族互嵌是民族团结的实践路径之一，但与以往路径的不同之处在于，民族互嵌型社会试图摆脱通过结构同化来追求民族团结的思路，“相互嵌入”描述的是各民族之间共生共荣、相互依赖的关系及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共同情感关联[14]。因此，民族互嵌并不意味着民族区隔或民族同化，而是民族之间在平等与和谐中形成一种内在关联，与之相对应的是多重文化认同的产生，多重文化认同是民族互嵌的结果表现之一。社会环境的改变促进了民族互动，民族之间的交集愈发广泛和亲密，深度互嵌的结果就是族际通婚的增加、民族文化的融合以及社区整体性不断凸显。随着互嵌过程的发展，民族性发生了变化，民族性是民族互动中可以区分群体的特有属性或标识，是民族的文化特征。然而民族性并不是永久不变的，民族与周边民族以及国家政府的关系，会导致民族性的流变[15]。在片马，民族文化的传承意味着民族性因原生文化的固有力量维系着民族的认同与文化特征，与此同时，民族互动又促使民族文化发生变化，而地域文化的生成正是民族文化融合的体现。并且中华文化、现代文化也在国家政权建设和边疆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深入边疆民族地区，不断融入地方文化，再造着地域文化的形态。民族性因民族互嵌的产生、发展也并非始终处于稳定的状态，民族性的流变也是民族认同变迁的重要原因。民族性的流变可以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来看，一是随着时间发展，民族性发生了变化，随之民族认同也转变；二是情境性变化，个体会在具体情境中突出或强调其中一种认同，民族性的情境性变化即是多重文化认同的存在机制。民族互嵌的构建推动了多重文化认同的形成，反之，多重文化认同的存在机制也再建着民族互嵌的社会结构。

从片马镇的情况来看，在居住空间、社会生活以及文化的互嵌过程中，各民族形成了以民族文化认同、地域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为基础的多重文化认同形态。这一认同结构表明，在多民族地区，文化多元仍然是重要的社会现实和基础，各民族的文化仍然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来源。其次，民族互嵌式社会的建设推动了民族关系从浅层次逐步到深层次的互嵌，这一过程促使地域文化的形成，推动多民族地区区域经济、文化、政治一体化的发展，这是多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再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地区在国家建设与治理过程中，不再是保守、传统的落后地区。随着国

家基层建设的不断推进，民族地区社会环境的不断开放，民族地区的现代性发展也不断深化，传统文化也随之发生着转变，人们对新的文化形态也不再完全排斥。总的来说，多重文化认同是多民族地区在互嵌式社区推进过程中生成的认同结构，具有社会现实基础，这一认同结构的存在也巩固着民族互嵌式社区的稳定发展。多重文化认同作为一种重要的心理基础和情感联系，从精神层面维系和巩固了地方民族团结。

六、结语

基于对片马镇生活空间、社会生活、文化方面互嵌的考察，可以看到民族互嵌是一个内外合力推动的过程，外部力量通过转化形成内部动力，巩固着民族互嵌式社区的稳定与发展。多民族地区民族互嵌的深入，意味着从浅层次的空间格局改变，逐步拓展到深层次的情感与心理的变化。而心理基础的形成正是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互嵌的结果，这种心理基础可以理解为民族之间的文化融通与彼此接纳的结果状态，体现为民族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认同，以及对一个地方共同体的认同。换言之，民族互嵌是多重文化认同生成的客观原因，而多重文化认同的存在机制，又反过来为民族互嵌社会结构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心理基础与保障。也就是说，文化认同本身作为一种“无形”的嵌入，从精神层面巩固了“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建设与地方共同体的发展，进而促进了地方民族团结的实现，为边疆社会的安定、团结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N］. 人民日报，2014－05－27（1）.

[2] 张少春. 互嵌式社会与民族团结：人类学的视角［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3] 闫丽娟，孔庆龙. 民族互嵌型社区建构的理论与现实基础［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6（6）：86－93.

[4] 郝亚明. 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现实背景、理论内涵及实践路径分析［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6（3）：22－28.

[5] 金炳镐.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概论［M］. 修订本.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140.

[6] 马戎. 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50.

[7] 杨荣. 云南民族互嵌研究［D］. 昆明：云南大学，2014.

[8] 戴庆夏. 片马茶山人及其语言［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2.

[9] 谭群瑛. 中越边境多族群语言接触与交融的调查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2015（1）：115－118.

[10] 胡小武. 民族互嵌型社会的动力结构及优化模式［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6（5）：50－56.

[11] PETTIGREW T F，TROPP L R. How does intergroup contact reduce prejudice：meta－analytic tests of three mediators［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08（38）：922－934.

[12] 王希恩. 民族认同与民族意识［J］. 民族研究，1995（6）：17－21.

[13] 周大鸣. 多元与共融：族群研究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4] 郝亚明. 民族互嵌型社区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理论分析［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6（4）：14－20.

[15] 向轼. 族群性的承变：苗疆边缘秀山苗族的生活［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5.